

郭预衡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历代散文精品

—



编委会成员

余冠英：著名文学史专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会员
主编：《诗经与楚辞精品》

曹道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编：《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

霍松林：著名文艺理论家、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书法家、
教育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兼秘书长
主编：《唐诗精品》

吴熊和：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
主编：《宋词精品》

王季思：中国古典戏曲协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编：《元曲精品》

邓绍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编：《明清小说精品》

郭预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主编：《中国历代散文精品》

张少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品》

目 录

(一)

导 论	郭预衡 (1)
-----------	---------

先 秦

《尚 书》

盘庚上	(16)
无逸	(21)

《国 语》

邵公谏厉王弭谤	(26)
晋人杀厉公	(29)
敬姜论劳逸	(31)
叔向贺贫	(34)
勾践灭吴	(37)

《左 传》

郑伯克段于鄢	(45)
曹刿论战	(49)
齐伐楚盟于召陵	(51)
宫之奇谏假道	(54)

晋公子重耳之亡	(57)
晋楚城濮之战	(68)
烛之武退秦师	(78)
秦晋殽之战	(81)
子产不毁乡校	(88)
子产论政宽猛	(89)

《战国策》

苏秦以游说而致富贵	(92)
范雎说秦王	(100)
邹忌讽齐王纳谏	(105)
冯谖客孟尝君	(107)
颜闾论士贵王贱	(112)
赵威后问齐使	(116)
庄辛说楚襄王	(119)
鲁仲连义不帝秦	(124)
触龙说赵太后	(132)
唐雎不辱使命	(136)

《论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141)
长沮桀溺耦而耕	(144)
子路从而后	(146)

墨 子

尚贤(上)	(148)
非攻(上)	(153)
公输	(155)

老 子

《老子》五章	(160)
--------------	-------

孙 子

- 谋攻..... (165)

孟 子

- 孟子见梁襄王..... (170)
齐桓晋文之事..... (171)
论天时地利人和..... (178)
论“好辩”..... (180)
论行先王之道..... (184)
齐人有一妻一妾..... (186)
鱼我所欲也..... (187)
民为贵..... (189)

庄 子

- 逍遥游..... (192)
养生主..... (202)
马蹄..... (207)
胠箠..... (211)

《列 子》

- 杞人忧天..... (220)
愚公移山..... (221)

导 论

郭预衡

中国古代散文，有自己的传统特征，与西欧文学理论所谓的“散文”有所不同。因此，论述中国古代的散文，不能限于抒情、写景的所谓纯文学作品。孔子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准此而言，则凡讲究文采的文章，都可视为散文。中国历来的散文选本，一般也都以此为准，约定俗成，这也可以说是编选散文的一个传统。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散文，不是始于所谓“文学自觉的时代”，而是始于商周时期。从甲骨记事开始，就已产生了片断的散文，此后《尚书》里的商、周之《书》，就已发展为相当完整文章了。我们这里编选的“历代散文精品”，即从商、周之《书》开始。

《尚书》里面的虞、夏之《书》，大抵皆后人的拟古之作。《尚书》也不免后人的增益和润色。但从思想倾向和语言特点看，大体上仍保留了本来面目。出语质朴，粗具文采，发号施令，比较直率。例如《盘庚》上篇，所记盘庚迁都的告谕之词有云：“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话是说得直率的，没有后世文章中的道德说教，但也不仅抽象地说理，而颇有形象性，例如说：“若颠木之有由蘖”，“若网在纲”，“若农夫服田力穡”，“若火之燎于

原”，“若射之有志”等等，取譬设喻，颇见文采。

在《尚书》之后，周书的散文更富文采，其中的几篇诰命之文，如《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等篇，吐辞命意，又有新的特点。例如《无逸》列举古来的帝王，谦恭谨慎，“所其无逸”，便享国长久。殷王中宗享国七十五年，高宗享国五十九年，祖甲享国三十三年。到了后代，由于“耽乐是从”，享国之年便短。“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文王以殷为鉴，“怀保小民”“不遑暇食”，也“享国五十年。”

《周书》的内容多讲历史经验，多讲谦恭谨慎，出言也比较委婉。这是新的时代特点。

先秦散文的更大变化，是在春秋战国。这时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私人讲学，处士横议，形于文字，便产生了论说之文和史传之文。

这时的论说之文的早期著作有《易传》。这是《周易》之后的阐释《周易》的理论文章，其文虽然未必出于孔子，却可能作于春秋之末。以其中的《系辞》而言，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春秋战国之际的文风特点。既讲天地变化，也讲人事吉凶，其中有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样的理论文章，是殷商、西周所不曾有的。既讲尊卑贵贱，又讲阴阳刚柔，这是新的思想。

《系辞》的思想内容比《尚书》、《周书》也更多哲学意味。例如说：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从安危治乱，讲到安身保国。不仅讲历史经验，而且讲处世

哲学。既讲人事，也讲政治。这样的文章总结了更多的治乱安危的经验，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易传》中的《文言》一篇，也是有代表性的作品，清人阮元特别称赏此文，他在《书昭明太子〈文选序〉》一文中说：“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阮元论文，主张骈体，因此，他特别称赞《系辞》中“奇偶相生，音韵相和”的语言特点。

春秋战国之际，各体文章，有时韵散不分，骈散不分。这时散文常带韵语。散中有骈，更为常见。这也是时代特点。

这个时期的散文著作，还有《论语》、《春秋》、《国语》和《左传》。

《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师徒的对话，是语录体的散文。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形式。师徒之间，坐而论道，不同于《尚书》中的诰命之辞。其中虽是片言只语，却常含有深邃的哲理。例如《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云：“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语虽甚简，而含义则深。有些对话，也极简炼。如《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中对话较长的一篇是《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此章也是各言其志，但写得更加生动，语言更有个性，不仅简炼而已。

《春秋》原是鲁国之史，传为孔子修订，文章极简，王安石虽曾讥为“断烂朝报”，其实是有汉语文章凝炼的特点的。

再晚一些的史传之文是《国语》和《左传》。二书相传都是左丘明所撰，内容比较接近，但也有相异之点。《国语》偏重讲述历史故事，用于训诫；而《左传》则“言事相兼”，更近于史家之文。例如《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虐”一段文字，就是叙述一段历史故事，引为教训。前因后果，鉴戒昭然。《国语》的文章开始

大概都是单篇流行，后来才辑为一书，先秦的著作，其成书过程，往往如此。

《左传》一书，成书或稍晚于《国语》，思想倾向与《国语》近似。其中更系统地记载了春秋之史，而且也更突出地记载了行人的言辞。记事记言，都比《国语》更为精炼，例如隐公元年所载“郑伯克段于鄢”一段文字，事件甚繁，而用语甚简，层次分明，结构严谨。所录人物的对话，也颇有个性特点。这是史传之文新的发展。

《左传》在记载人物的语言方面，特点是突出的，特别是“行人”的“辞令”，委婉曲折，极有特征。例如写子产于襄公二十五年伐陈而献捷于晋，晋人质问，子产对答，振振有辞，致使晋人无可辩驳。孔子为此而发表评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

对于《左传》的辞令之美，后人多有评价，唐刘知几《史通·申左》云：“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又于《载言》篇云：《左传》之文，能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左传》之长于记事，也是突出的。例如所载几大战役，举凡战前之酝酿，战时之情景，战后之结局，故事情节，都井井有序。再如叙述重耳流亡之始末，子产施政之过程，都体现了记事之文的新发展。

先秦散文发展变化更大的时期是战国。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又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章氏谓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虽不甚确切，但战国之文有大发展，则是事实。

这时的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九流十家，影响最大。就文章而言，影响最大者，则有儒、墨、道、

法和纵横家。

战国时期的儒家之文，首推《孟子》和《荀子》。孟轲和荀卿都是孔门后学。《孟子》文章，思想和艺术都比前期的《论语》有所发展。其纵横博辩、放言无惮，表现了先秦儒家之文的特点。其中宣讲仁政，批评暴政，称道先王，指斥暴君，敢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且谓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诸如此类的言论，皆后世儒者所不敢言。其为文议论之恣肆，气势之充沛，也就远非后世儒者之文所能企及。

《荀子》之文，气势之盛，不及《孟子》，但文章也有放言无惮的特点。不仅在人性论方面，不同于《孟子》，而且对于诸子百家，也多有非议。其《非十二子》一篇，更是敢于放言的。还有在天人关系方面，敢言人定胜天，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点。至于《劝学》一篇，引物连类，取譬设喻，文章写得十分精密，又俨然一派学者之气。

墨家本不尚文，《墨子》一书，也不尚文采，其文章对后世影响亦小。但在当时，儒墨皆称“显学”。而且墨子讲“三表”之法，文章自是一家。

对于墨家的思想，孟轲攻击不遗余力，杨墨并提，以为“无父无君”，同于“禽兽”。荀卿也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但庄子则称赞墨家，说“其生也勤，其死也薄”，“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乃天下之“才士”。今从《墨子》中《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诸篇看来，其中对于王公大人之指责，多半是从万民百姓之利出发。在诸子百家中，这一特点是很突出的。

这时散文成就最高的是道家。道家的代表著作是《老子》和《庄子》。尽管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也说不要“采色”和“文章”，但《老子》五千言，不仅“时有愤辞”，而且多是韵语。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庄子》之文，尤其恣肆。其《逍遥游》、《齐物论》各篇，形象之生动，设想之奇

瑰，皆非诸子百家所能企及。鲁迅称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法家也是不讲文采的，但文章自有特点。其代表著作是《韩非子》。此书具有崭新的历史观点，也有无所讳忌的言论。其《五蠹》一篇，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说远古的天子享受甚薄，而当今的县令享受甚厚，故古之天子不难让位，而今之县令不肯去职，从物质实利来论证，不用道德观念来说教，这是早期地主阶级思想家坦率真实的文字。其时代特点是很突出的。

战国后期，最有时代特点的文章，是纵横家言。其代表著作是《战国策》。此书一般视为史传著作，但从全书的主要思想倾向看，实属纵横家。其中记载了大量的纵横家的言论和活动。虽是列国纷争的历史，也是纵横家活动的历史。纵横家的思想和言论，与当时各家比较，更加恣肆放诞，纵横捭阖，颇受后世儒者讥评。但就先秦散文而言，其文极有特点。宋人李文叔《书〈战国策〉后》云：“《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谄诌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向其说之美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这种看法，是有代表性的。

九流十家之中，还有杂家一派，其代表著作是《吕氏春秋》。此书“合儒墨，兼名法”，不主一家，但主要倾向似在名法。且杂道家之言。这是战国晚期之文的特点。明人方孝孺《读〈吕氏春秋〉》谓此书敢于“诋訾时君”，指出了其书的时代特点。

自从秦并六国，天下一统，执行文化专制，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文章的发展变化影响极大。《文心雕龙·诠赋》说：“秦世不文。”就是文化专制的后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列举秦世作者，首推丞相李斯。李斯之文，可称者有《谏逐客书》，写于早期，尚有战国纵横风气。到了秦兼天下之后，他又写过几篇刻石之文，颂德纪功，与前时所作不同。

汉代初年，由于多年战乱，经济困难，当时萧、曹为政，法

网比较疏阔，没有立即实行文化专制的政策，于是汉初作者，又杂学诸子，为文颇有战国纵横之气。如贾谊之《过秦论》、《陈政事疏》，晁错之《论贵粟书》、《言兵事疏》等，虽已不同于战国策士之辞，却仍有管、商、纵横的余风。

到了武帝之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对散文的发展变化，又是一大关键。从董仲舒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的汉代儒生之文，汉代的儒生，不同于先秦的儒者。其文风也与先秦儒者不同，不过，“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在武帝之时，并未做到令行禁止。儒术虽受到尊崇，而黄老管商之学也仍然流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思想并未一统，文风也未一统。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之文，就仍有先秦的遗风。其中对于历史上的不公，人世间的 不平，多有揭示，其“是非”标准，与某些儒者不同。

在司马迁以后，汉代的儒学思想统治虽然日益加深，但散文之可称者，几百年间，为数仍是不少。即以东汉的班固而论，所著《汉书》，尽管颇受汉儒正统思想规范，但是，有些篇章，如《司马迁传》、《李陵传》、《杨王孙传》等，也都写得很有特点。此外，东汉散文值得注意的，还有王充的《论衡》，指责时弊，批评世风，与当代儒者之文大不相同。再到东汉之末，有些儒者之文，亦有新的变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仲长统的《昌言》，对于现实社会，多所批判，其中《理乱》一文，揭露末代的弊政，颇有新的时代特点。

文章开始大的变化，是汉魏之际。这时汉代的王纲解纽，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发生动摇。尤其是曹操开始当权之时，为了政治需要，大破传统思想。他下令“求贤”，宣称“不拘品行”，而“唯才是举”。他写文章，也能打破传统的格式，在他的影响之下，文章变化很大。所以鲁迅称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写的《求贤令》、《自明本志令》等，都是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作品。与曹操同时的作者，还有孔

融，此人思想之开放，文章之放诞，也是汉代少见的。所为文章，如《论称衡书》、《论盛孝章书》，都写得“气扬采飞。”（《文心雕龙·章表》）还有《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等，也写得通脱任性，无所顾忌。这样的文章，在汉魏之际，开了新的风气。

这时还出现了“建安七子”。“七子”包括孔融，但孔融与曹操同辈，文风与其他诸子不同。其他诸子，都是曹丕、曹植周围的文人，他们的文章与曹丕、曹植相似。述志抒怀，也是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所谓“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既是诗的特点，也是文的特点。

魏晋之际，文章又有新的变化和发展。这时司马氏当权，“以孝治天下”，又提倡儒学，弘扬名教。这时文章的代表作者有阮籍和嵇康。《文心雕龙》称他们两人“师心以遣论，使气以命诗”。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讲“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讲“非汤武而薄周孔”，都是针对当时而发的愤慨之辞。

两晋时期，诗文可称者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目，但就散文而言，王羲之是最突出者。他的文名一向为书名所掩。他的名篇《兰亭集序》，亦以书传，而非仅以文传。其实，他的很多文章如《与会稽王笺》、《报殷浩书》、《遗谢安书》、《戒谢万书》以及《誓墓文》等，都很有特色。

东晋之末，晋宋之际，文章由“师心”、“使气”趋向“和平”。这时的代表作者是陶渊明。鲁迅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加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和平的文章的人有陶潜。”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等，都是写得和平的。但是，渊明之文，也正如其诗，既有和平的一面，亦有愤激的一面。

再到宋、齐、梁、陈几代，朝代更易更加频繁，士人的思想

观念变化很大，文章的变化亦大。这时三教并存，人无特操，文崇藻丽，骈语盛行，四六行文，蔚为风气，“偏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时的作者，有“文雅的庸主”，也有“柔媚的词臣”，世人鄙薄六朝之文，概指这类作品。但是，对于六朝之文，亦未可一概而论，在这期间，也涌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作者。例如鲍照，他是以《芜城赋》见称于世的，但其文之可称者不止于此。《登大雷岸与妹书》、《瓜步山楬文》以及《请假启》等，都很有特色。

鲍照在六朝时期，是“才秀八微”的作者，他的作品与一般的“庸主”或“词臣”之文有所不同，故在当时独具特色。

至于一些词臣之文，特色又自不同。其内容虽不免贫乏，而文采却比较出色。例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邱迟的《与陈伯之书》，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徐陵、庾信晚年的作品，也都很有特点。

当然，更有时代特点的，是盛行于这个时期的书札小品，例如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都写得清新秀丽，刻画山水，前所罕见。

这时的北朝之文，亦受南朝影响，例如酈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兰记》，虽重征实，亦杂骈语。

庾信和颜之推，都是由南入北的作者，他们的文风都有变化，“庾信文章老更成”，显然是受身世影响。所抒“乡关之思”，不同于早期之作。颜之推自称“家世文章”本来独具特点；晚年所作，更自为一体，《颜氏家训》之文，风格独特。

隋时统一南北，年祚甚短，虽禁“文华”，但文章变化不大。

到了唐代初年，天下一统，太宗为治，不同于秦皇汉武，开国之后，没有实行文化专制，而是广开才路，广开言路，这对一代文章的发展，颇有影响。

这时的文章作者，多是前代归附之臣和布衣特起之人。例如

魏征，言事进谏，写了许多很有政治热情的文章。披肝沥胆，言无不尽，颇有新的时代特点。这样的文章与前代的词臣之文相比，已大不相同。

到了高宗、武后时期，文章开始变化。这是和政局的变化有关系的。高宗不再求言纳谏，官路才路，都不似贞观年间。在这个时期，产生了王勃等初唐“四杰”之文。

四杰之文也是有特点的。形式上虽多沿袭六朝的骈体，而内容则多抒发怀才不遇的牢骚。这些作者，在唐初开明政治的启迪之下，曾经幻想建功立业而不切实际，一遇蹉跌，便又牢骚愤闷。王勃的许多文章都有这样的情感，其《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之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就是这种情调。骆宾王之写《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也和他个人怀才不遇有些关系。

武后时期，建立“大周”新朝，政局变化更大。改制度，易服色，俨然改朝换代。在这易代之际，出现了一批新的词臣。其代表作者有李峤、崔融、宋之问等。李峤的《自叙表》和崔融的《则天哀册文》，都是词臣之文的代表作。

但这时也有几个不同流俗的作者，最杰出者是陈子昂。子昂仕当武后之朝，屡谏极刑，力陈时弊，敢于直谏，又继承了唐初的传统，他“少学纵横术”，行文也纵横驰骋。

在这以后，经过“开元”年间，唐朝又出现一段政治比较开明的历史阶段，与“贞观”同样，史称盛世。但此后不久，便到天宝年间，唐朝的国势由盛转衰，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变化很大，文章变化亦大。许多作者，目击时艰，忧时念乱。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是元结。他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的特点。有些文章对于官吏的贪残，对于平民的疾苦，揭示得十分痛切。忧世之心愤世之情，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的朝政日益腐败。许多文人学者，都希望有所变革。在“永贞革新”前后，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一

批古文家，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者。韩愈的很多文章都是旨在改革弊政，特别是主张选拔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他的《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原道》、《原毁》以及《进学解》等一系列的文章，都有这样的内容。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直接参与者，他的《贞符》、《封建论》等许多文章，都讲“辅时及物”，以救济生民为急务。贬官之后的《永州八记》一类文章，也和单纯模山范水的游记之文不同。韩愈一派的作者如李翱、皇甫湜等，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都依然关心时政。柳宗元一派的作者如刘禹锡、吕温等，所为文章，和柳宗元的倾向基本相同。

韩愈、柳宗元这时写作古文，并且带领了一批作者致力于古文，后世称为“古文运动”。表面看来，好象“古文运动”只是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体，而提倡古朴的散体。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改革文章的内容。当时古文家们都讲“明道”，实际上就是宣扬一种政治理想，用这种政治理想来改革当时的弊政。

到了唐末，朝廷更加腐败。一些文人学者如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不复从事朝政改革，不再多讲“文以明道”，也不再写“明道”的“古文”，而写出了杂文小品。鲁迅说：“这时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藪》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这样的文章，在唐末，也最有时代特征。

五代十国，天下大乱，直到宋初，才归一统。宋初之政，也似唐初，比较开明。在广开才路，广开言路方面，比唐初还进一步，于是一批文人学者，积极干政。有宋一代，关心朝政得失的文人学者，比唐代更多。事情无独有偶，这时的一些古文作者，大半也都是朝政改革中的参与者。例如“庆历新政”时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熙宁变法”时期的王安石、苏轼、苏辙等，都

是和朝政改革关系甚深的作者，这些作者，也即是后世所谓“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其中欧阳修在古文运动中影响甚大，他主盟文坛，曾巩、王安石、苏轼父子都曾得到他的赏识和启迪。他的文风也影响了一代文章的变化。北宋一代的平易自然、明白晓畅之文，主要是在欧阳修倡导之下形成的。在欧阳修以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者是苏轼。苏轼之文，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而止于所不得不止，自谓“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达到了挥洒自如的极高的境界。他和欧阳修一起，为文代表北宋时期的最高成就。

南宋一代，国家偏安，抗战救亡，文人更多干预时政，早期的李纲、宗泽、胡铨、岳飞，后期的辛弃疾，陈亮等，都写出了激昂慷慨的政论文章。到了南宋之末，国破家亡，又有文天祥、谢翱等人，写出了悲歌慷慨之作。当宋元易代之际，还有邓牧，著《伯牙琴》，抨击君权，直继魏晋作者批判暴君暴政的传统，与唐宋古文的道统不同。

金、元两代之文，是继承唐宋传统的。元代王恽挽刘祁诗有云：“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即是说，思想继承宋人道学的传统，文辞继承唐宋古文的传统。这话说出了金、元两代文章的基本特征。金、元两代之文，从元好问到姚燹、虞集，所为文章，大抵如此。尤其是宋儒道学的影响是最明显的。

明代初期之文，又受元人的影响。当时号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是元末黄潘等儒者的学生，所受道学影响亦深。他在明初写的文章，如《阅江楼记》之类，歌颂新朝，甚为得体，颇有元代“治世之音”的风气。他的“馆阁之文”，已经近于此后的“台阁体”。这同明初的极权专制也颇有关系。

到了永乐年间，极权专制继续加强，再到仁、宣之世，国家“太平无事”，这时身居台阁而又主持文柄的有杨荣、杨溥、杨士奇等，号称“三杨”，他们的文章，号称“台阁体”。这类文章主